

崛起中國的權力政治或文化認同？ 歷史上中韓關係的實證檢驗 1368-1449

楊仕樂

（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摘 要

中國崛起是當今舉世所關注的課題。相對於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邏輯，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中國崛起的結果並非是物質力量所決定，而是取決於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文化認同：崛起中國的內涵不同，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感知也會不同，彼此的互動就跟著不同。此說是否確實為真？本文嘗試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比較秦漢、隋唐、遼、金、元、明的興起，並以明初時的朝鮮為焦點，檢驗朝鮮是否真的拒斥一個內涵上不被它所認可的崛起中國，而相對地欣然接受一個內涵上為它所認可的崛起中國。

關鍵詞：現實主義、建構主義、文化認同、中國崛起、中韓關係

壹、前言

中國崛起是當今舉世所關注的課題。中國崛起後會怎麼對待周邊的國家？周邊國家又會怎麼與中國相處？依照國際關係學界中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邏輯，物質能力的消長就決定了國家的行為，強權的興起終究會引起他國的群起制衡，即使仍能成為霸權，他國的服從也不

過是在力量懸殊之下的不得已。¹然而，在建構主義看來，像現實主義這樣只看物質層面並不妥當，物質能力的消長還需要透過理念的作用才會決定國家的行為：如果從物質的角度切入，英國的核武遠比北韓的核武強大，美國為何不反對英國的核武，而只反對北韓的核武呢？這正是理念的不同所致。²循此，如果說中國崛起產生負面影響，也不是因為中國崛起的本身，而是因為崛起中國的內涵：如果今天崛起的中國，不是現在這種內涵的中國，而是另一種內涵的中國，局面可能就不一樣了。崛起中國的內涵不同，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感知也會不同，彼此的互動就跟著不同。

當然，這樣假設性的問題無法直接以今天的中國來驗證，但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崛起並不是第一次，秦漢、隋唐、遼、金、元（廣義而言）、明、清，每一次崛起時中國的內涵都不盡相同，而既有的研究也從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中，發現了與現實主義權力政治邏輯迥異的現象。明朝時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就是最鮮明的例證，朝鮮可謂是最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與中國之間也因為這文化的聯繫而產生了認同感。³根據明朝方面的史料記錄，在這儒家文化的認同

1. 相關討論請見 John J. Mearsheimer, "Author's Response: Will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lash?" *Issues & Studies*, Vol. 39, No. 2, June 2003, pp. 259-262; Jack S. Lev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bert S. Ross &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28。

2.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71-81.

3. 儘管文化包括語言、飲食、穿著、建築、習俗、宗教、文學、藝術、音樂、思想等諸多層面，但政治上儒家文化認同是否影響中國崛起後與他國間的互動，仍是當今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關於中國崛起論辯的焦點。請見 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之下，明朝不惜犧牲與損耗，出兵保全了明朝其實認為沒有國防戰略價值的朝鮮；⁴而在朝鮮方面的史料記錄中，明朝此舉也確實感召了朝鮮，使朝鮮明知明朝已然衰弱卻仍拼死效忠，甚至持續到明朝滅亡之後。⁵在此，文化認同的作用被肯定了，權力政治的邏輯沒有像現實主義所標榜的那樣，並不能超越時空、古今中外都適用。⁶不過，後續的問題仍有待回答。畢竟，在這些既有的研究中，為了凸顯文化認同的作用，選取的是中國崛起後走向衰弱的明末時期，但中國崛起之初呢？雖說明朝的衰弱也就是清朝的興起，清朝這樣被朝鮮認為是「蠻夷」內涵的崛起中國，在興起時的確是不受朝鮮的歡迎；但明朝這被

-
-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October 2010, pp. 591-622 ; David C.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Winter 2003/2004, pp. 165-180 ; Shih-Yueh Yang,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ese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1745-1860* (Saarbrücken: Golden Ligh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7), pp. 1-291 ;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328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22。
4. 楊仕樂，〈中國文化與中國對外行為：「興滅繼絕」理念與朝鮮「壬辰倭亂」〉，《政治科學論叢》，第70期，2016年12月，頁159-196。
 5. 楊仕樂，〈東亞朝貢體系的實證檢驗：朝鮮的案例研究1618-1637〉，《問題與研究》，第56卷第1期，2017年3月，頁53-79。
 6. 當代現實主義聲稱其解釋有普遍性，例如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8-10。對當代現實主義的批判，請見 Hartmut Behr & Amelia Heath, “Misreading in IR Theory and Ideology Critique: Morgenthau, Waltz and Neo-Re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2, April 2009, pp. 327-349。

朝鮮認為是儒家內涵的崛起中國，在興起時就受朝鮮的歡迎嗎？朝鮮是否就拒斥內涵上不為朝鮮所認可的崛起中國，而接受內涵上為朝鮮所認可的崛起中國呢？⁷

本文有著學理探討上與政策應用上的重要性。在學理上，本文除了是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兩類競爭觀點的再次檢驗，也將引入更多歷史上中國國際關係的素材，使歷來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研究能夠更豐富、更多元，促進歷史學界與國際關係學界的交流。在政策上，本文的成果也有助於應對崛起的中國。倘若建構主義的觀點獲得驗證，則崛起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很可能也取決於他們之間的文化認同。⁸既然中國歷次崛起時曾有不同的內涵，今天崛起中國的內涵也不是註定不能改變的。今天的中國，內涵其實已有漸漸在轉變，如何促進中國持續改變其內涵，或許就是中國崛起後，能否與區域的和平、穩定、繁榮並存的關鍵。

貳、歷史背景

歷史上，朝鮮究竟如何看待、回應崛起的中國？歷次崛起時，中國的內涵有所不同，是否也就因此而使朝鮮有不同的反應？關於這個

7. 本文採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將繁複的概念簡化形成因果推論，再據以進行實證檢驗。相關討論請見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2-40；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pp. 1-17。

8. 易言之，研究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並不是想從這過往中，期待當中國再一次崛起，其他國家就會自願臣服，而是從這古今的對比中凸顯文化認同的重要：即使日後中國在力量上重回曾有的優越地位，但若文化無法為周邊國家所欽慕，中國仍不會是領導者。而以目前中國的內涵來看，恐怕也正是如此。請見 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pp. 621-622。

在國際關係學界顯得陌生、往往訴諸直覺印象的問題，歷史學界已經有相當的研究累積，⁹ 提供了許多有用的線索，不過尚無所需的充分解答。

一、秦漢的崛起

秦漢時期可謂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崛起，首次成為東亞地區的單極霸權。漢朝建立後，至漢武帝時始「獨尊儒術」，往後做為中國文化標誌的儒家思想，此時才剛開始較廣泛、全面地滲入中國的政治之中。¹⁰ 此時的朝鮮，是如何回應崛起的中國呢？因為史料證據的缺乏，相關研究不免難以進行。目前僅大約知道，漢朝建立後要求朝鮮進貢不成，漢武帝遂派兵攻打，並設立真番、臨屯、樂浪、玄菟等四郡予以統治。¹¹ 朝鮮為何不向漢朝進貢，不歡迎此時的崛起中國呢？是因為中韓間的文化認同尚未建立嗎？還是朝鮮覺得漢朝並沒有強大到難以抵抗的程度呢？在缺乏較詳細史實重建的情況下，自然也很難深究文

9. 當代韓國重要學者如申采浩、朴殷植、李丙燾、申奭鎬等人，對古代中韓關係的研究，多強調韓國的主體性對中國壓迫的抵制，甚或認為在中國堯、舜等遠古時代的韓國根本比中國強大，不認為韓國認同中國文化而順從中國。請見李揚帆，〈身份認同：韓國對中韓歷史的選擇性敘述與中韓關係〉，《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09年第1期，2009年3月，頁44-46；王元周，〈韓國人的歷史觀與中韓關係〉，《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09年第4期，2009年10月，頁138-155；林月惠，李明輝，《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39。少數的異議則可見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年），頁146-151。主張韓國認同中國文化，如後文所述，多為中國的學者。

10.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國立編譯館，1982年），頁105-108。

11. 朱立熙，《韓國史》（臺北：三民，2008年），頁7-15。此時被漢朝攻滅的朝鮮，史稱「衛滿朝鮮」（在此之前的朝鮮則是「箕子朝鮮」），統治範圍大約占整個朝鮮半島的三分之二。

化認同的因素，在此時對中韓的互動究竟有無影響。

二、隋唐的崛起

隋唐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的崛起，且力量更勝於上一次。此時中國的內涵相較於秦漢時代，已是有混入所謂「胡風」的不同樣貌，在精神上除了原有的儒家思想，玄學、佛學更是興盛。¹²面對這樣的崛起中國，朝鮮如何回應呢？大致而言，既有的研究並不否認此時的中韓關係裡，有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考量，但仍認為朝鮮此時開始「仰慕」中國文化，故大量予以引進。¹³從時間順序來看，這些研究只能呈現隋唐的中國崛起「之後」，朝鮮如何吸納了中國的文化，並形成了此後彼此的文化認同感，但並不能解答在隋唐興起「之際」，尚未大量接納中國文化的朝鮮，究竟如何看待、回應此時崛起的中國。

精確而言，此時的朝鮮，是分為新羅、百濟、高句麗（高麗）的三國時期，彼此之間已征戰不休達六百多年。¹⁴三國之中，與唐朝最為親近的，是相對最弱小的新羅，¹⁵它在唐朝的協助之下，於西元 668 年統一了朝鮮。¹⁶從這樣的情境來看，與其說是新羅仰慕唐朝的文化而接

12. 錢穆，《國史大綱》，頁 276-283。

13. 姜維東，〈唐朝對東北亞諸政權的文化輸出研究〉，《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06 年第 4 期，2006 年 4 月，頁 141；李元淳，崔柄憲，韓永愚著，詹卓穎譯，《韓國史》（臺北：幼獅文化，1987 年），頁 45-55。

14. 漢武帝在朝鮮設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仍屢遭反抗，玄菟郡更因此而數次重劃行政範圍。西漢滅亡後，歷經東漢、魏、晉等朝，朝鮮與中國時有衝突，朝鮮各族也彼此交戰，漸漸形成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請見朱立熙，《韓國史》，頁 8-10，15-20。

15. 朱立熙，《韓國史》，頁 24。

16. 但在百濟、高句麗相繼覆滅後，唐在兩國成立傀儡政權防止新羅坐大，新羅於西元 671 年主動與唐決裂，雙方交涉多年未果，於 676 年爆發戰爭，新羅大勝，唐被迫與新羅劃界談和，新羅一統朝鮮半島。請見朱立熙，《韓國

受這樣的崛起中國，還不如說是在權力政治考量下聯合唐朝來對付百濟、高句麗。不過，對於新羅究竟為何與唐朝親善，相關的研究相當缺乏，而主要聚焦在新羅與唐朝友好之後，新羅如何引進唐朝文化，且以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認為新羅「仰慕」中國文化，所以歡迎唐朝的崛起，還派出大量的留學生與僧侶到唐朝學習。這類研究指出，新羅與百濟、高句麗不同，每年皆派員至唐朝留學；而唐朝對於新羅的留學生，也多給予十年的時間居留，有別於他國的九年居留期。¹⁷大批的留學生歸國後，將唐朝的各種政治制度融入新羅。¹⁸新羅僧人大批前往唐朝，返國後也將中國佛教的各個流派，傳布於新羅。留學生和僧侶分別影響新羅上層與下層階級，新羅也就更加「仰慕」中國文化。¹⁹

相對於新羅，既有研究認為百濟與唐朝間的關係是「反抗式遵從」，這最終也導致百濟被新羅與唐朝聯合攻滅，國王和王室被唐朝俘虜。²⁰此後，他們雖然接受唐朝的冊封，但語言、文化上的差異，仍造成雙方的隔閡，歷經數代後才終於被同化。²¹至於百濟民間接受中國文化的過程，現有研究亦採取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認為百濟「仰

史》，頁 15-16，21-25；李基白著，林秋山譯，《韓國史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 年），頁 120-123。

17. 郭麗，〈唐代留學生教育管理制度述論〉，《北京社會科學》（北京），2016 年第 10 期，2016 年 10 月，頁 69。

18. 王建宏，趙莎，〈「唐風東漸」與新羅「骨品制」的瓦解—以新羅的遣唐留學生為中心〉，《懷化學院學報》（懷化），第 33 卷第 12 期，2014 年 12 月，頁 7-9。

19. 李海英，〈唐朝與新羅的海上通路與文化交流—以留學生、佛僧為例〉，《通化師範學院學報》（通化），2015 年第 9 期，2015 年 9 月，頁 97-101。

20. 姜清波，〈百濟國末代王室及後裔在唐朝的漢化過程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州），第 166 期，2012 年第 11 月，頁 151。

21. 姜清波，〈百濟國末代王室及後裔在唐朝的漢化過程考述〉，頁 151-164。

慕」中國文化。²²那麼，百濟在唐朝崛起之際，為何是「反抗式遵從」？是雙方實力對比的真實反映？抑或是文化認同尚未建立？既有的研究相當缺乏。

比起新羅、百濟，高句麗則是朝鮮三國中最強大者，也對中國最為抗拒，隋唐兩朝數次出兵朝鮮半島，主要目標就多是攻打高句麗。隋朝於西元 598、611、613 年三度出兵高句麗；唐朝也是數次派兵，唐太宗甚至在西元 644、649 年兩度發動三十萬大軍出擊但皆以失敗收場，直到唐高宗時聯合新羅才消滅了高句麗。²³不過在此同時，高句麗對隋、唐的朝貢卻一直沒有中斷。²⁴其中原委究竟如何？是雙方實力對比的真實反映？抑或是文化認同尚未建立？既有的文獻亦未有著墨，甚至連高句麗如何吸收中國文化的相關研究，都相當稀少。²⁵

三、遼、金、元的崛起

唐之後，宋、遼、金時期，儘管三者並未有任何一方達到單極獨霸的程度，而可說是先後形成了多極或兩極的狀態，但若以軍事上較占優勢的遼、金來當作崛起的中國，朝鮮的反應似乎是較符合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觀點。朝鮮此時已經吸收了中國的漢文化，面對遼、金這樣的異族政權，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看，應該是類似明末清初那般，抵制遼、金而心向宋朝，但朝鮮此時在宋、遼、金之間卻有權力政治的手腕。唐朝時被新羅統一的朝鮮，於西元 892 年起分裂出泰封與後百濟，形成「後三國」，而後泰封將領於西元 936 年再度統一半

22.陳永，〈百濟音樂舞蹈的源流、研究現狀及當代研究的可能性取向〉，《星海音樂學院學報》（廣州），第 138 期，2015 年 3 月，頁 128。

23.朱立熙，《韓國史》，頁 15-16，21-25。

24.程尼娜，〈隋唐高麗朝貢制度研究〉，《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13 年第 2 期，2013 年 2 月，頁 105-115。

25.張春海，〈高麗移植唐代法制之變形及其歷史背景〉，《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2008 年第 3 期，2008 年 5 月，頁 71-79。

島，建立起王氏高麗王朝。²⁶既有的研究認為，朝鮮儘管在此時的確因為文化認同的理由而親宋，也確實對「蠻夷」的遼相當鄙視，但在關鍵時刻仍是以自身利益為重，準確拿捏己方實力及宋遼之間的相對強弱，做出最適當判斷，時而親宋拒遼，時而棄宋投遼，是典型的權力政治考量。²⁷對金也是如此，在宋聯金滅遼結果被金一併擊潰後，朝鮮儘管不滿金的威逼，但實力懸殊之下仍識相地臣服了。²⁸不過，這類的研究對於其間決策的原委，是採取想當然爾的推理方式來論述，而不像對明末清初中韓關係的研究那般，有原始史料為根據。

遼、金之後是元朝，面對這也是異族所建立的朝代，若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看，朝鮮應該也是予以抵制，但元朝實在是太過強大，朝鮮即使奮力抵抗最後也只能接受，形成類似明末清初時的狀況。不過，這樣的推理並不盡然符合當時實際發生的情形。此時的朝鮮仍是高麗王朝主政，²⁹面對蒙古的興起，雙方最初結為「兄弟之國」共同對付金，但於西元 1231 年決裂，蒙古大舉入侵、屠殺，朝鮮也奮力抵抗，1258 年雙方議和但朝鮮武將反對，其後一直持續抵抗至 1270 年才

26. 李元淳，崔柄憲，韓永愚著，《韓國史》，頁 91-92，97-100，139-143。

27. 張登及、金世勛，〈朝貢體系下中小國家的避險行為：朝鮮半島兩個歷史案例初探〉，《政治學報》，第 63 期，2017 年 6 月，頁 63-79。

28. 李基白著，《韓國史新論》，頁 217-220；姜吉仲，《高麗與宋金外交經貿關係史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 年），頁 1-424；陶晉生，〈宋、高麗與遼的三角外交關係〉，陶晉生主編，《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1984 年），頁 169-180；王民信，〈高麗王朝對遼金元初興時的「拒」與「和」〉，王民信主編，《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63-78；黃寬重，〈南宋與高麗的關係〉，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主編，《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 年），頁 61-85。

29. 遼始於西元 916 年、宋始於西元 960 年、金始於西元 1125 年、元始於 1271 年，王氏高麗王朝則起於西元 918 年，至西元 1392 年結束，此時中國已是建立於 1368 年的明朝了。請見朱立熙，《韓國史》，頁 61-64。

不支投降，最後於 1271 年臣服於元朝。³⁰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如果說是權力政治，蒙古強大必須臣服，那為何還反抗數十年之久，未像對遼、金那樣識實務？是因為文化認同上無法接受蒙古這樣的「蠻夷」嗎？那為何一開始又能與之結盟呢？對此，現有研究顯得相當簡略，³¹ 較詳細者則只側重於朝鮮臣服於元朝以後，雙方民間的經貿與文化往來。³²

四、明朝的崛起

如果元朝算中國第三次崛起，明朝就是中國的第四次崛起，明朝像宋朝一般強調儒家思想，但國力更勝於宋朝，尤以成祖時在東南亞與印度洋的大規模遠航，³³ 與多次出擊戰勝韃靼、瓦剌等強敵之際達於巔峰。³⁴ 正因為在明末時，朝鮮拼死效忠明朝，抗拒清朝這「蠻夷」的崛起中國，則在明朝建立之初，朝鮮理應歡迎這樣的崛起中國才是。明朝的崛起，是在朝鮮從唐朝開始大量接受中國漢文化之後，特立於異族遼、金、元、清等朝的崛起，可謂是檢驗文化認同論點的關鍵案例。只是，既有的研究對於元末明初的中韓關係甚少著墨，³⁵

30.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783-784。

31.朱立熙，《韓國史》，頁82-84。

32.孫紅梅，〈元朝與高麗「舅甥之好」關係下的文化交流〉，《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錦州），第30卷第2期，2008年3月，頁101-106；陶然，〈論宗藩體系下元麗文學交流的新格局〉，《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杭州），第41卷第5期，2011年9月，頁43-49。

33.鄭永常，《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臺北：稻鄉，2004年），頁57-91

34.毛佩琦、李焯然，《明成祖史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114-141。

35.有研究認為朝鮮的態度是元、明相對實力消長的反映，朝鮮徹底倒向明朝是因為北元勢力退出遼東。請見刁書仁，〈論明前期斡朵里女真與明、朝鮮的

主要的例外是范永聰 2009 年的《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一書。³⁶

明朝建立之際，朝鮮仍是王氏高麗王朝主政。范永聰指出，此時的朝鮮在敗退的元朝（史稱「北元」）與興起的明朝之間面臨抉擇，政變頻繁、政策反覆，與明朝關係不時陷入緊張，甚至到了戰爭邊緣。直到李氏推翻王氏、朝鮮全面倒向明朝，雙方關係才告穩定。在李氏主政之前，朝鮮內部分為親元朝的武臣一派，與親明朝的文臣一派。武臣們親元朝，據范永聰的研究是因為四個理由：(1) 朱元璋生性猜忌異常，且厭惡朝鮮內部諸臣；(2) 朱元璋懷疑朝鮮表面恭順，實際上卻勾結北元；(3) 朝鮮常在政變後處決明朝使節，使朱元璋不滿而實施外交報復，親明朝的文臣們對此都頗有微詞，使武臣更有理由親元朝；(4) 因為前述諸多嫌隙，朝鮮內部謠傳朱元璋將對朝鮮發動殲滅戰。³⁷ 這些理由看來都駁斥了文化認同的論點，即使是衰弱後的「蠻夷」，朝鮮卻還有所眷戀，但范永聰在此主要的根據並不是原始史料。

至於文臣們為何親明朝，范永聰則認為有五個原因：(1) 明朝聲勢浩大而北元日漸瓦解；(2) 明朝給朝鮮的條件優於元朝；(3) 受儒學的影響；(4) 朝鮮自古仰慕中國文化；(5) 為了區別夷夏，與篤信佛教的元朝做切割，朱元璋崇儒抑佛，此舉深獲朝鮮習儒文臣之心。由於朝鮮最後是捨棄北元效忠明朝，顯然文臣的見解最終壓倒了武臣，但文臣究

關係—兼論女真對朝鮮向圖們江流域拓展疆域的抵制與鬥爭》，《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2002 年第 1 期，2002 年 3 月，頁 44-54。另有研究則認為朝鮮全面倒向明朝，是因為希望擺脫元朝控制維護自身地位，同時因傳統欽慕中華文化，需要獲得冊封取得合法性。請見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頁 37-38。

36. 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9 年），頁 1-296。

37. 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 119-127。

竟為何支持明朝呢？前述五項理由，前兩項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考量，至於後三項則支持了文化認同的論點。於此，范永聰的研究明顯側重於後三項理由，³⁸只是他主要採取想當然爾的推論，而沒有原始史料證據的支持。

另一方面，朝鮮李氏王朝建立後，明朝並沒有立即予以冊封。明太祖對於政變後朝鮮的輸誠冷漠以對，但朝鮮仍不放棄、不斷嘗試，最後終於在明太祖死後的西元 1401 年如願，此後朝鮮對明朝也一直非常恭順，雙方關係可謂平靜無事。³⁹這又是為什麼呢？從文化認同的觀點來看，朝鮮是因為自責曾與「蠻夷」的北元交好，而甘願忍受明朝的冷漠嗎？還是說，朝鮮是擔心強大的明朝報復，故其實是權力政治考量？而後，雙方關係融洽，也是因為彼此的文化認同嗎？抑或是因為明朝國力此時正如日中天，朝鮮就算有不滿也不敢說呢？對此相關的研究非常缺乏，就連事件的描述都很稀少。⁴⁰

參、研究架構

面對既有研究的缺口，如果要在推理之外，確切證明文化認同的作用，朝鮮的確是拒斥一個內涵上不被朝鮮所認可的崛起中國，而接

38. 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 127-139。

39. 簡江作，《韓國歷史》（臺北：五南，1998 年），頁 273-274；朱立熙，《韓國史》，頁 101-103。

40. 僅有的少數研究，主要是關於此後雙方的文化交流與李成桂的身分考證，例如王永一，〈女真東北面登場的朝鮮太祖李成桂研究〉，《中國邊政》，第 161 期，2005 年 3 月，頁 27-38；王永一，〈朝鮮初期女真族裔大臣李之蘭在政界的活躍〉，《中國邊政》，第 177 期，2009 年 3 月，頁 45-58；盧鳴東，〈以禮治國：朝鮮建國儒臣推行中國古禮的作用〉，《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長沙），第 20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44-51；羅樂然，〈漢語與事大——從朝鮮的漢語翻譯人材培訓看其對明政策的轉變〉，《漢學研究集刊》，第 19 期，2014 年 12 月，頁 109-136。

受一個內涵上為朝鮮所認可的崛起中國，則應該要對秦漢、隋唐、遼、金、元、明等時期，朝鮮如何回應崛起中國的原委，進行類似明末清初時期的詳細決策過程追溯(process tracing)。於是乎，史料存在與否就成了最大的限制因素，而這史料的限制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既有研究為何存在缺口的原因。

秦漢之際，朝鮮相關史料付之闕如；此後至隋唐時期，朝鮮方面亦無史料保存，而只有經過重新彙整書寫的《三國史記》，⁴¹無法詳細追溯期間任何事件的決策過程。宋、遼、金、元時期朝鮮是王氏高麗王朝主政，編有記載其歷代君臣之間決策討論的《高麗王朝實錄》，但現已全數亡佚，只剩下以之整理、編纂而成，內容大幅精簡的《高麗史》及《高麗史節要》，⁴²也無法詳細追溯期間任何事件的決策過程。這段時期就是中國方面，也無史料可循。唐代史料只剩中期以後的一小段，其餘都已亡佚；⁴³宋代史料保存也有限，充其量只能間接地

41. 《三國史記》成書於西元 1145 年，由王氏高麗王朝宰相金富軾主編，記載新羅 992 年（西元前 57-西元 935 年）、高麗 705 年（西元前 37-西元 668 年）、百濟 678 年（西元前 18-西元 660 年）三方爭雄的歷史。不過，目前一般咸信，金富軾在此書中刻意扭曲、竄改、捏造史實，且鑿刻甚重，故其內容並不可信。請見金富軾編著，孫文范等校勘，《三國史記》（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年），頁 1-10；苗威，〈三國史記的歷史影響探析〉，《北京理工大學學報》（北京），第 11 卷第 1 期，2009 年 2 月，頁 33-38。

42. 《高麗史》由朝鮮李氏王朝初期的鄭麟趾主撰，全書用中文寫成，體例依中國正史紀傳體，涵蓋時間自西元 918 年迄 1392 年，編纂過程相當嚴謹，經歷三次大修，共 15 年。《高麗史》成書次年，當時史館總監金宗瑞，再就《高麗史》中重大事件所需補充說明的相關資料，編成《高麗史節要》，耗時一年。這兩部史書保存了許多史料，雖相當有價值，但畢竟經過大量刪減與編輯，已不復史料完整原貌。請見金渭顯，〈《高麗史》對於研究遼史金史的貢獻〉，《東吳歷史學報》，第 15 期，2006 年 6 月，頁 117-144。

43. 安史之亂（西元 755-763 年）後，唐朝宮廷典藏的五萬餘卷重要檔案全數焚毀。此後雖陸續添補，但經黃巢之亂（西元 875-884 年）再遭火焚，且此後

推敲朝鮮與遼、金之間的關係，而無法提供任何直接的記錄。⁴⁴

如今朝鮮遺留下來的完整史料，僅有《李朝實錄》，也就是前述明朝初年李氏推翻王氏高麗王朝之後，李氏王朝的官方記錄，⁴⁵同一時期明朝方面也有官方紀錄《明實錄》可供參照，遂成為唯一仍可以詳細研究的對象。而就時間來看，明朝初年也正是前述檢驗文化認同論點的關鍵時段。究竟在 1368 年明朝建立之後，直到 1449 年土木堡之變，也就是明朝走向衰弱的分水嶺，這近百年的時光裡（事件年表請見附錄），朝鮮究竟是如何應對崛起的明朝？

於此，明初中韓關係重大事件的決策過程檢視，可以朝鮮李氏王朝建立的 1392 年為界線分為兩個階段來進行。其一是 1392 年以前，此時，朝鮮尚在北元與明朝之間搖擺不定，明朝對朝鮮曾達戰爭邊緣，但未實際出兵。如果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觀點是正確的，「朝鮮因認同明朝中國的儒家文化，而歡迎明朝這樣的崛起中國」，那麼在朝鮮方面的史料中，應該發現對明朝儒家文化的欣賞與崇敬，主張趕緊擺脫蠻夷的北元導向朝鮮的論點；而在明朝的史料中，也應該要有

唐朝中央政府衰敗，檔案紀錄遠不如盛世時完備，因此唐朝史料僅餘末期一小部分。請見杜維運，《中國史學史（二）》（臺北：三民，1998 年），頁 314-316。

44. 元朝國史館依照宋朝所保存的史料編成《宋史》，但當時所用的史料，現除少部分以外均已亡佚。此外，《宋史》成書倉促、錯誤百出、迴護諱飾，為史學家們所詬病。請見杜維運，《中國史學史（三）》（臺北：三民，2004 年），頁 123-124。

45. 朝鮮李氏王朝非常重視史料編纂，各代李氏朝鮮國王與大臣的朝議均被妥善的保存，而後整理為今日所見之《李朝實錄》，涵蓋李氏 27 代君主共 519 年的史料。現《李朝實錄》除有民國史家吳晗整理三十餘年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外，亦有數位資料庫開放網路線上檢索。請見李基白著，《韓國史新論》，頁 330-331；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1-15。

讓朝鮮歡迎的理由，也就是基於儒家思想主張應感召朝鮮，勸阻企圖對朝鮮使用武力的相關論點。⁴⁶反之，如果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觀點才是正確的，則在朝鮮的史料中，應該要發現其對北元與明朝相對實力的研判，或利用北元與明朝對峙的情勢遊走其間的論點；而在明朝史料中，也應該要發現各種主張出兵攻打朝鮮的論點，但因為用兵困難而作罷之類的戰略利害分析（請見表 1）。

表 1 因文化認同而臣服？西元 1368-1392 年中韓關係的關鍵問題

現象：朝鮮搖擺於明朝與北元間，雙方曾達戰爭邊緣但並未開戰	
支持文化認同 解釋所需證據	朝鮮：仰慕儒家文化，亟欲擺脫北元倒向明朝
	明朝：以儒家思想感召朝鮮，勸阻對朝鮮使用武力
支持權力政治 解釋所需證據	朝鮮：利用北元、明朝的矛盾遊走其間
	明朝：出兵朝鮮窒礙難行、得不償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其二是 1392 年以後，此時朝鮮已經全面效忠明朝，朝鮮努力輸誠、雙方關係和睦，如果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觀點是正確的，「朝鮮因認同明朝中國的儒家文化，而歡迎明朝這樣的崛起中國」，那麼在這段期間裡，在朝鮮方面的史料中，應該發現對明朝儒家文化的欣賞與崇敬，自責先前曾與北元往來，故在明朝冷漠的回應下，仍熱切爭取明朝的認可；而在明朝史料中，也應該有對朝鮮如此恭順的稱許與

46. 於此，就算物質力量本身就驅使明朝不要過度使用武力攻打朝鮮，但儒家思想仍可幫助明朝順應這樣的物質力量，而不重蹈漢、隋、唐黷武出兵攻打朝鮮的覆轍。關於此一儒家文化促成順應物質條件的邏輯，請見楊仕樂，〈儒家文化、軟權力與霸權抉擇：清初的案例研究(1676-1735)〉，《政治學報》，第 64 期，2017 年 12 月，頁 75-103。

嘉勉，建議接受朝鮮的效忠。反之，如果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觀點才是正確的，則在朝鮮的史料中，應該要發現對明朝如此傲慢的抱怨與不滿，但明朝強大無法反抗只好隱忍的論點；而在明朝的史料中，也應該發現明朝自恃強大，主張可以對朝鮮予取予求的論點（請見表2）。

表2 因文化認同而臣服？西元1392-1449年中韓關係的關鍵問題

現象：朝鮮努力輸誠，雙方關係和睦	
支持文化認同 解釋所需證據	朝鮮：仰慕儒家文化，自責曾與北元往來，努力爭取明朝認可
	明朝：朝鮮恭順，應予以接納、冊封
支持權力政治 解釋所需證據	朝鮮：雖然不滿，但明朝強大得罪不起
	明朝：自恃強大，故對朝鮮可予取予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實證研究

本文隨後即依據前述表1、表2的引導，開始針對附錄所列事件，檢索朝鮮與明朝方面的紀錄尋找證據。令人遺憾地是，史料中相關決策討論的記載並不多，本文也只發現相當有限的證據支持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論點，但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論點則獲得明顯較強的證據支持。

一、1392年朝鮮李氏王朝建立以前

明朝建立之初，朝鮮的王氏高麗王朝立即的選擇是倒向明朝，出兵攻打北元在遼東的殘部。於此，《李朝實錄》雖有追溯開國君主李成桂在發動政變前的事蹟，但同時期高麗王朝內部文武大臣在親明

朝、親北元之間的討論並無記載。在僅有的紀錄中似乎流露出李成桂對明朝的文化認同，認為朝鮮與明朝有文化淵源。首先是洪武二年（高麗恭愍王十八年，西元 1369 年）的記載：

……元亡，與分司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等，招集亡元遺眾，割據東寧府，憾其父見誅，入寇北鄙，必欲報仇。王以臣事大明，欲擊東寧府以絕北元。十二月，以太祖（即李成桂）為東北面元帥……。⁴⁷

另外是洪武三年（高麗恭愍王十九年，西元 1370 年）的記載：

太祖（即李成桂）以親兵一千六百人至義州……又勝金、復州等處曰：「本國與堯竝立，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賜之履西至于遼河，世守疆域。元朝一統，釐降公主，遼、瀋地面，以為湯邑，因置分省。叔季失德，天子蒙塵於外，遼、瀋頭目官等，罔聞不赴，又不修禮於本國……嘯聚虐民，不忠之罪，不可逭也。」⁴⁸

不過，明朝在明洪武二十一年（高麗辛禡十四年，西元 1388 年）出兵大敗北元殘部，並準備在遼東、朝鮮半島北半部設立「鐵嶺衛」管轄。然而朝鮮認為這裡應是朝鮮的領土，遂計畫聯合北元殘黨出兵攻打明朝，朝鮮內部雖有人反對但被處死，而就在朝鮮還沒付諸行動

47.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조실록 1 권, 총서 46 번째기사 태조가 동북면 원수가 되어 기철의 잔당과 북원과의 관계를 차단하고, 동녕부를 회복코자 하다〉, 2017 年 9 月 18 日 (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46>。

48.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조실록 1 권, 총서 49 번째기사 동북면을 공격하고 나하추 등이 있는 곳에 방을 붙여 기새인첩목아의 행방을 탐문하다〉, 2017 年 9 月 18 日 (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49>。

之際，明軍已經逐步開進，「禍得西北面都安撫使報，遼東兵至江界，將立鐵嶺衛。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使至於此。』大明復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⁴⁹對此，李成桂認為出兵窒礙難行因而反對，國王本來也覺得有道理，但群臣都執意出兵，無法中止：

四月……謂太祖（即李成桂）曰：「寡人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禍頗然之。太祖既退，謂瑩曰：「明日，宜以此言復啓。」瑩曰：「諾。」夜，瑩入白：「願毋納他言。」明日，禍語太祖曰：「業已興師，不可中止。」太祖曰：「殿下必欲成大計，駐駕西京，待秋出師，禾穀被野，大軍足食，可以鼓行而進矣。今則出師非時，雖拔遼東一城，雨水方降，軍不得前卻。師老糧匱，祇速禍耳。」禍曰：「卿不見李子松耶？」太祖曰：「子松雖死，美名垂於後；臣等雖生，已失計矣，何用哉！」禍不聽，太祖退而涕泣，麾下士曰：「公何慟之甚也？」太祖曰：「生民之禍，自此始矣。」⁵⁰

朝鮮出兵後，戰況果然不利，李成桂建議趕緊撤退但被拒絕，遂憤而班師回朝發動政變自立為王，開啟李氏王朝：

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以來，事大以勤。玄陵於

49.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조실록 1권, 총서 81 번째기사 명에서 칠령 이복의 땅을 요구하자 요동 정벌을 논의하다>, 2017年9月18日(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81>。

50.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조실록 1권, 총서 83 번째기사 요동 정벌이 결정되었으나, 4 가지 불가한 이유를 들어 태조가 반대하다>, 2017年9月18日(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83>。

洪武二年，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孫萬世，永為臣妾。」其誠至矣。……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況今暑雨，弓解甲重，士馬俱憊，驅而赴之堅城之下，戰不可必勝，攻不可必取，當此之時，糧餉不給，進退維谷，將何以處之？伏惟殿下特命班師，以答三韓之望。」禍與瑩不聽……太祖乃諭諸將曰：「若犯上國之境，獲罪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予以順逆上書，請還師，王亦不省，瑩又老耄不聽。盍與卿等見王，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乎？」⁵¹

從以上對戰情的分析來看，即使是推翻親北元的王氏高麗王朝，建立起李氏朝鮮王朝、一面倒親明朝的李成桂，他在政變前反對出兵的理由明顯是朝鮮無力反抗明朝，支持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解釋。

至於明朝方面的史料也大多沒有內部討論的紀錄，多僅有最後公布的詔書。從中，明朝建立之初似乎也是用文化感召，希望朝鮮臣服，洪武元年 12 月 26 日（1369 年 2 月 3 日），明太祖詔告朝鮮：

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為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餘不多及。⁵²

對此朝鮮派人向明朝示好，明太祖遂於洪武二年 8 月 14 日（1369 年 9 月 15 日）予以冊封，其中既以儒家文化感召朝鮮，但也認定朝鮮位置的確偏遠：

51. 국사편찬위원회, < 태조실록 1 권, 충서 84 번째기사 태조가 조민수와 함께 위화도에서 회군하다 >, 2017 年 9 月 18 日 (檢索), <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84>。

5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明實錄 二》(臺北: 中研院史語所, 1967 年), 頁 749-750。

爾高麗天造東夷，地設險遠，朕意不司簡生釁隙，使各安生。何數請隸，而辭意益堅；群臣皆言當納所請，是以一視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虔懇，命承前爵儀，從本俗法，守舊章。嗚呼！盡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鑒！既從朕命，勿萌釁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誥曰：「咨爾高麗國王王顥，世守朝鮮，紹前王之令，緒恪尊華夏，為東土之名藩，當四方之既平，嘗專使而往報，即陳表貢，備悉衷誠，良由素習於文風，斯克勤修於臣職。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齎印，仍封為高麗國王……」⁵³

此後的詔書中，明太祖於洪武二年冬 10 月 1 日（1369 年 10 月 31 日）告誡朝鮮，認為其國王疏於政務、戰備，有愧職守，言詞之間雖也是訴諸於文化感召，但也透露出明朝的兵力的確還未伸展至朝鮮：

凡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無廳，事則無以示尊嚴於臣下，朕甚不取也！歷代之君不問夷夏，惟修仁義禮樂以化民成俗；今王棄而不務，日以持齋守戒為事，欲以求福，失其要矣！佛之道，三皇五帝之時未聞有也，而是時天下大治，後世務釋氏而能保其國者未之見矣！梁武之事，可為明鑒……今胡運既終，沙塞之民無所總統，朕兵未至遼、沈，其間或有強暴者出，不為中國患，必為高麗擾。況倭人出入海島十有餘年，必知王之虛實，此亦不可不慮也。⁵⁴

此後的紀錄顯示，明太祖要求對朝鮮的進貢寬大處理，似乎是意在感召朝鮮。洪武三年冬 10 月 1 日（1370 年 10 月 20 日），「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入貢，多齎私物貨鬻，請徵其稅』。上曰『遠夷跋涉萬里而來，暫爾鬻貨求利，難與商賈同論，聽其交易，勿徵其

5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三》（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7 年），頁 866-867。

5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三》，頁 907-911。

稅』」；⁵⁵ 洪武四年3月15日（1371年4月1日），「中書省臣奏言『高麗國郎將李英等因入朝貢多帶物出境請加禁止』。詔『勿禁』」。 ⁵⁶ 不過，朝鮮進貢時的摩擦仍使明太祖訓誡朝鮮，詞語間雖仍主要是文化感召，但也暗示儘管朝鮮偏遠，明朝仍有使用武力的可能。洪武六年10月11日（1373年10月27日）：

君天下者，以天心為心。今朕居中國；王居滄海之東，限隔山海本與中國無相損益。然古昔之君往往致討伐之師，何也？豈非常有不足於中國者乎？今王之使者，挾詐懷欺，陰致奸謀而不虞受禍，王之貢馬，其數五十匹，使云『道亡者二』，而至京如數，乃甲兩以己馬足之，詢之云『欲自進於東宮，因道亡，遂以備數』。命使問之，果王言乎？抑汝意乎？對曰『非王自願也』，春秋之法，人臣無私交。王之使者越風濤之險，以奉貢獻，而又挾私以行詐，此果以小事大之禮乎！然此小事，朕非欲較短長，恐行人失辭，嫁禍於王，故明言之。」⁵⁷

此後的紀錄顯示，進貢時的摩擦仍不時發生，明太祖一方面雖還是使用文化感召好言相勸，但已愈加不耐。洪武七年5月7日（1374年6月17日）：

朕雖不德，未嘗不察王之忠而卻來誠之美。若漢唐之夷，彼隋君之東征；在朕今日，苟非詐侮，於我安肯動師旅以勞遠人？若不守己分，妄起事端，禍必至矣。自今寧使物薄而情厚；勿使物厚而情薄，王其思之。仍令中書咨其國責，以大府監之失。⁵⁸

5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三》，頁 1116。

5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三》，頁 1197。

5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四》（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7年），頁 1518-1520。

5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四》，頁 1574-1575。

此後朝鮮發生內亂，國王被殺，但朝鮮持續派使節要求明朝冊封，其間除貢品短少，甚至殺害明朝使節，同時又接受北元冊封、停用洪武年號，明太祖不滿之餘開始威脅使用武力，要朝鮮不要自以為位置偏遠就能保全。洪武十年12月29日（1378年1月28日）：

……歲貢馬千匹差其執政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仍以所拘遼東之民悉送來還，方見王位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否則弑君之賊之所為，將來奸詐並生，肆侮於我邊陲，將構大禍於高麗之民也。朕觀彼奸臣之計，不過恃滄海重山之險固，故敢逞凶跳梁，以為我朝用兵如漢唐；不知漢唐之將長騎射，短舟楫，不利涉海，朕自平華夏、攘胡虜，水陸征伐，所向無前，豈比漢唐之為！⁵⁹

洪武十一年12月30日（1379年1月18日）明太祖再次威脅使用武力，不要以為有天險可恃：

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耳；不知滄海與吾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艫千里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爾類，豈不俘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⁶⁰

洪武十三年1月1日（1380年2月7日）再度斥責朝鮮：

高麗貢不如約，以詔問之曰「曩元之馭宇運未百年，而天命更朕代元，為君臨御，十有三載，四夷入貢……獨爾東夷固恃滄

5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五》（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7年），頁1904-1905。

6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五》，頁1966-1967。

海，內殺其王、外構民禍，貢不如約！必三韓之地有為故若是歟！命使往問叛服不常將欲何為！」⁶¹

儘管如此，明朝終究沒有出兵攻打朝鮮，並於洪武十八年1月16日（1385年2月25日）宣告：

……蕃邦小國多矣，有能知天命，守分限，不恃險阻，修禮事上，以保生民，未有不綿其國祚。若施譎詐、肆侮慢，未有不構兵禍以殃其民。高麗王王顥，自朕即位以來，稱臣入貢，朕常推誠待之大，要欲使三韓之人舉得其安。豈意王顥被弑而殞，其臣欲掩己惡，來請約束，朕數不允，聽彼自為聲教，而其請不已，是以索其歲貢。然中國豈倚此為富？不過以試其誠偽耳。今既聽命，其心已見，宜再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汝宜以此意諭之。⁶²

再於洪武十八年7月3日（1385年8月9日）接受「高麗權國事王禡複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趙胖上表，獻馬，請襲爵，並請其故王王顥封謚。從其請。」⁶³後於洪武十八年7月20日（1385年8月20日）「詔頒誥於高麗國，封王禡為高麗國王，其故王顥賜謚『恭愍』，以國子學錄張溥為詔使，行人段裕副之，國子典簿周倬為誥使，行人雒英副之。」⁶⁴

此一決策轉折的考量相關史料記錄，僅有洪武十五年9月17日（1382年10月24日），頗受明太祖賞識的重臣桂彥良的上奏：

……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三伐高麗，

6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五》，頁 2043。

6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六》（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7年），頁 2584-2585。

6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六》，頁 2645。

6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六》，頁 2648-2649。

而中國蠱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煩勤兵於遠哉。惟北狄遺燼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關防，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方裨於治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⁶⁵

從中比對之前的詔書可以發現，儘管先前明太祖曾有明朝可克服地理阻隔的豪語，但實際上攻打朝鮮仍是得不償失之舉，而儒家文化在此的確使明朝順應此一物質現實，沒有像漢朝、隋朝、唐朝那般出兵，但從先前所列朝鮮方面的紀錄來看，這顯然未能感召朝鮮。此後，洪武二十年12月26日（1388年2月4日）明朝告知將在遼東、朝鮮半島北段設立「鐵嶺衛」：「命戶部咨高麗王，以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其土著、軍民、女直、韃靼、高麗人等，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人民悉聽本國管屬。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復有所侵越。」⁶⁶並於三個月後開始進兵，引起前述朝鮮的不滿，決定攻打明朝，對此明朝方面的紀錄是在洪武二十一年4月18日（1388年5月24日），認為遼東、朝鮮半島北段雖曾為朝鮮所有，但後來為元朝所占，現在明朝驅逐了元朝，當然歸明朝所有，認為朝鮮無理取鬧：「高麗地壤，舊以鴨綠江為界，從古自為聲教，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為其自生釁端也。今復以鐵嶺為辭，是欲生釁矣。」⁶⁷明朝派兵設立「鐵嶺衛」，成了明初中韓關係的分水嶺，雙方原先中間隔著北元殘部，此後則直接接觸。從前述朝鮮李成桂反對因此攻打明朝的

6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六》，頁 2332-2338。

6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七》（臺北：中研院史研所，1967年），頁 2807-2808。

6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七》，頁 2867-2868。

理由來看，現實主義式的權力政治解釋明顯勝出。

二、1392年朝鮮李氏王朝建立以後

1392年以後的中朝關係，《明實錄》中鮮少詳細記載，多只有進貢數額與時間的流水帳，但《李朝實錄》中則有記載明朝對朝鮮的詔書，與朝鮮內部的討論與最後的回應。

朝鮮李氏王朝成立後向明朝輸誠，但明朝並未熱烈歡迎，只是要朝鮮有狀況都要立即上報明朝。明洪武二十五年11月27日（朝鮮太祖元年11月27日，1392年12月11日）：

……欽奉聖旨「高麗前者差人來奏本國情由，今覽來辭，不過前日之事。然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易，高麗限山隔海，天造東夷，非我中國所治。爾禮部回文書，聲教自由，果能順天意合人心，以妥東夷之民，不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文書到日，國更何號，星馳來報。欽此。」⁶⁸

此後，明朝則於洪武二十六年4月8日（朝鮮太祖二年4月8日，1393年5月18日）決定將鐵嶺衛的範圍縮小到鴨綠江為止，「徙遼東鐵嶺衛治於沈陽、開元兩界，古麗州之地」，⁶⁹但明朝、朝鮮雙方都無史料記載此一決定背後的討論，是因為明軍進駐受挫，或是明朝此時對李成桂釋出善意、施以文化感召主動讓步。接下來，明洪武二十六年5月23日（朝鮮太祖二年5月23日，1393年7月2日）《李朝實錄》中則記錄了明朝對朝鮮的不滿，以及威脅使用武力：

68.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조실록 2권, 태조 1년 11월 27일 갑진 1번째기사 1392년 명 홍무(洪武) 25년 국호를 정하는 문제에 대한 예부의 자문을 계품사 조임이 가져오다〉, 2017年9月18日(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10111027_001>。

6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 八》（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7年），頁3312。

……一、近者，暗遣人說誘女真，帶家小五百餘名，潛渡鴨江，罪莫大焉。……一、口稱稱臣入貢，每以馬至，令秦馬調之，馬皆驚下，亦皆乘乏勞倦者，侮之一也。一、更國號一節，遣人請旨，許爾自為，或祖朝鮮，爾為苗裔。使者既還，杳無音信，反作鸞端，侮之二也。……乃何爾高麗，速構兵殃？朕又將昭告上帝，命將東討，以雪侮鸞之兩端。若不必師至三韓，將誘女真之人全家發來，并已往女真大小送回，朕師方不入境。⁷⁰

對於明朝如此的態度，李成桂一再恭謙輸誠，懇求明朝能正式冊封他。如明洪武二十七年1月26日（朝鮮太祖二年5月25日，1394年2月16日）：

使華荐至，帝命是宣，感極涕零，愧深汗洽。竊念自古，殊俗之在遠，皆知中國之當尊，故懷惠而畏威，必効忠而嚮化，苟或違此，無以自存，歷代以來，明効可驗。況臣幸遭昭代，屢奉德音，俾臣知軍國之權，許臣更朝鮮之號，得藉天威之重，以定眾心之歸，常懷圖報之末由，何敢生鸞之不已？……國已更號，臣未正名，第緣典故之未諳，實非姦侮之是肆。譴責深切，乃天地玉成之心；誨諭丁寧，實父母生育之惠。茲有成命，謹用欽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視遠以明，字小以德，恕臣迷謬，許臣自新。臣謹當嘉與一方之民，永祝萬年之壽。⁷¹

對此，明朝最後終於接受了朝鮮。李朝實錄中記載了明朝方面的

70.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조실록 3권, 태조 2년 5월 23일 丁卯 1번째기사 1393년 명 홍무(洪武) 26년 흠차 내사 황영기 등이 조선의 국왕을 위협하는 조서를 가지고 오다>, 2017년 9월 18일(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10205023_001#>。

71.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조실록 5권, 태조 3년 1월 16일 병진 1번째기사 1394년 명 홍무(洪武) 27년 수창궁에 거동하다. 판문하부사 안종원 등이 경사로 가지고 간 표문>, 2017년 9월 18일(檢索), 《조선왕조

說詞，明洪武三十一年 5 月 14 日（朝鮮太祖五年 5 月 14 日，1398 年 5 月 30 日）：

然我至尊，奉天勤民，豈肯以兵強天下？諭之曰：「毋生邊釁。」……今數十年矣。自始至今，切戒毋生邊釁，未嘗以兵強爾國，強為約束。今王代前王王氏為君，又幾年矣，其「毋生邊釁」之諭，未審王曾諦聽者乎？雖然自王即位以來，以釁隙之言、擾邊之釁，已聞構釁之原。……漢、隋、唐、遼、金、元此數代，其主宰三韓者，纔有微釁，其前諸帝，奮然興師，其生靈受害，又非淺淺事。事雖往古，靜思兵禍，孰不寒心？今王疊生釁隙，我至尊又將昭告于上下神祇，何也？非敢以血氣之勇為之，惟恐彼此有傷生靈，故不為也。⁷²

明朝自認是自我克制、慈悲為懷，沒有像漢、唐等朝動輒自恃武力強大就攻打朝鮮，但朝鮮並未受此文化感召。在《李朝實錄》中記載，朝鮮之所以不斷謙卑輸誠，是因李成桂雖然憤怒但還是不敢違抗強大的明朝，明顯支持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解釋，見於明洪武二十六年 5 月 25 日（朝鮮太祖二年 5 月 25 日，1393 年 7 月 4 日）的紀錄：

上以帝命，命推刷泥城、江界等處來投女真人物。上謂左右曰：「帝以兵甲眾多，政刑嚴峻，遂有天下。然以殺戮過當，元勳碩輔，多不保全。爾乃屢責我小邦，誅求無厭；今又責我以非罪，而脅我以動兵，是何異恐喝小兒哉！」都承旨李稷曰：「然則何以對之？」上曰：「吾且卑辭謹事之耳。」命與侍中趙浚、

실록》，<http://sillok.history.go.kr/id/kaa_10301016_001>。

72. 국사편찬위원회，〈태조실록 14 권，태조 7년 5월 14일 경신 2번째기사 1398년 명 홍무(洪武) 31년 천추절 계본을 잘못 쓴 3 사람을 추가 압송하라는 예부의 편지와 조서 및 광해릉의 문초장〉，2017年9月18日（檢索），《조선왕조실록》，<http://sillok.history.go.kr/id/kaa_10705014_002>。

金士衡等，議所以奏聞。⁷³

明太祖死後，明惠帝繼位但燕王（明成祖）起兵反對，惠帝陣營的守軍要求朝鮮政治庇護，朝鮮面臨抉擇。此時朝鮮國王為定宗，他本想收容，但大臣反問要是燕王獲勝，如何向燕王解釋？定宗於是放棄，見於明建文二年5月17日（朝鮮定宗二年5月17日，1400年6月4日）：

伯英曰：「今燕王舉兵，而中國亂矣，設有定遼衛求降於我，則許之否乎？」上曰：「此正所深慮也。然不若不受之為愈也。」知經筵事權近曰：「魏主之失，唯在不從曄諫，而許詐降而已；受定遼之降，有大不可者。若燕王定亂而有天下，則必問罪於我矣，其時何以對之？上言甚合於義。」上曰：「卿言是也。」⁷⁴

這明顯反映了權謀的考量，同時朝鮮內部也對明惠帝、燕王之間的相對實力與勝算有所掌握。明建文四年3月6日（朝鮮太宗二年3月6日，1402年4月8日）：「賀聖節使參贊議政府事崔有慶，回自京師。有慶啓曰：『燕兵勢強，乘勝遠鬪；帝兵雖多勢弱，戰則必敗。』」⁷⁵也因此，儘管朝鮮方面輾轉接獲惠帝所發出勤王詔書，但完全沒有回應。不久之後惠帝戰敗，明成祖即位詔告朝鮮，明永樂元年9

73.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조실록 3권, 태조 2년 5월 25일 기사 2번째기사 1393년 명 홍무(洪武) 26년 이성 등지로부터 의탁한 여진인을 돌려 보내도록 하고, 황제에게 주문할 일을 의논하다〉, 2017년 9월 18일(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aa_10205025_002>。

74. 국사편찬위원회, 〈정종실록 4권, 정종 2년 5월 17일辛巳 2번째기사 1400년 명 건문(建文) 2년 경연에서 《통감촬요》를 강론하다가 권근과 요동의 정세를 논하다〉, 2017년 9월 18일(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ba_10205017_002>。

75.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종실록 3권, 태종 2년 3월 6일 기축 1번째기사 1402년 명 건문(建文) 4년 하성질사 최유경이 연왕의 군사가 경사를 쳤

月 9 日（朝鮮太宗三年 9 月 9 日，1403 年 9 月 25 日）：

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統御之初，朝鮮國王能知天命，首陳表貢，父皇嘉其忠誠，甚加優待。後來其國，奸宄生釁，侮慢百端，如表箋，內含譏諷；進馬，多癘病不堪；鞍內寫字，褻慢無禮。父皇卻其貢獻，取其造惡之人至京，論以國法，姦謀畢露。父皇好生之心，同於天地，不忍誅之，止發遠方安置。……不幸父皇賓天，建文不仁不孝，故違祖訓，將所取回之人，阻當不發。朕即位之初，遣詔諭之，彼能恭順天道，念我父皇深恩，即遣陪臣，奉表貢獻。朕體父皇之心，已給與誥印……。⁷⁶

這樣的言詞在朝鮮聽來是恫嚇甚於感召。朝鮮大臣要此時的朝鮮國王太宗不要像之前那樣自立太子後才上報，而應事前請示，才不會引起明朝不快。明永樂四年 8 月 24 日（朝鮮太宗六年 8 月 24 日，1406 年 10 月 5 日）：

上王傳付殿下之時，適中國方有燕亂，不暇生釁於外國，但於回咨，反覆致意，以示其意。此皆幸而免耳，非萬全之計也。方今當中國堂堂無事之時，我國亦無汲汲危亂之變，殿下欲效其前轍，不先請命，傳付世子，而後計稟，是臣所謂事同而勢異者也。⁷⁷

했다는 소식을 전하다》，2017 年 9 月 18 日（檢索），《조선왕조실록》，<http://sillok.history.go.kr/id/kca_10203006_001>。

76. 국사편찬위원회，〈태종실록 6 권，태종 3 년 9 월 9 일 甲申 2 번째기사 1403 년 명 영락（永樂）1 년 우정승 성석린 등이 면복과 서책을 내린다는 예부의 자문을 가지고 오다〉，2017 年 9 月 18 日（檢索），《조선왕조실록》，<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0309009_002>。

77. 국사편찬위원회，〈태종실록 12 권，태종 6 년 8 월 24 일 庚戌 3 번째기사 1406 년 명 영락（永樂）4 년 길창군 권근이 전위의 불가함을 상서하

朝鮮對明朝的畏懼也反映在處理日本海盜的問題上，朝鮮一方面想要積極處理向明朝輸誠，但又擔心積極過度若使明朝要求朝鮮一同攻打日本，得不償失。明永樂七年3月16日（朝鮮太宗九年3月16日，1409年4月1日）：

慶尚道水軍僉節制使金乙雨，捕倭船二隻，兵馬都節制使尹子當盡殺之。……上聞之曰：「皇帝曾有命曰：『倭人寇中國邊疆，還向朝鮮，可預備捕捉』。今將所取兵器獻於天子可也。」大臣以為：「中國若曰：『倭奴，亦爾所惡也。我遣舟師以攻之，汝其助之』，則其將何以？」議遂寢。⁷⁸

另一個證據是朝鮮在恭順之際仍有防備明朝入侵的打算。明永樂七年11月14日（朝鮮太宗九年11月14日，1409年12月20日）：

西北之境，接於中國，時當冰合，一鞭可渡。況今中國兵興，若有一朝之變，如紅賊之來，先據此道，國家將何以應之乎？事之至迫，悔之何及！義州、江界，雖遣節制，軍勢單弱，恐難禦之。臣等願以平壤以北之勁兵，授之良將，屯戍要衝，待中國平定冰解而罷。⁷⁹

다) 2017年9月18日(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0608024_003>。

78.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종실록 17 권, 태종 9년 3월 16일 기미 3번째기사 1409년 명 영락(永樂) 7년 상전이라고 주장하는 왜선 2척을 잡다. 병마 도절제사 윤자당이 모두 죽이다》, 2017年9月18日(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ca_10903016_003>。

79. 국사편찬위원회, 《태종실록 18 권, 태종 9년 11월 14일 임오 2번째기사 1409년 명 영락(永樂) 7년 군량의 확보, 진헌마, 왜인의 본국 거주 등에 관한 문제점을 지적한 사간원의 시무책》, 2017年9月18日(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ca_10911014_002>。

此後，明朝要求朝鮮進貢更多馬匹，讓朝鮮不堪負荷，認為明成祖窮兵黷武、暴虐無道，但朝鮮仍不敢不從。明永樂二十一年8月2日（朝鮮世宗五年8月2日，1423年9月6日）：

「中國去年求馬一萬匹，今又求一萬匹，本國之馬比舊為減，又未強壯。往時士大夫家有馬，不下數匹，庶民皆有實馬，今士人之家不過一匹，亦皆疲弱，況庶民乎？軍政莫急於馬，而擇實馬二萬匹以獻，則是減二萬騎兵也。此臣所以中夜不寢而憂慮者也。……今皇帝凡所施為，多非有道之事。北狄大亂，征戰不已，則以我國褊少，其能應無已之求乎？萬有天命已去，此輩得志，則不可終守臣節，繼是必以此數徵之不已。臣愚以為，今不奏減，則萬世之患也。」末生亦以此意啓之。既出，上與六代言議之，皆曰：「許稠之言可謂深慮遠計也。且前者進馬之時，義州疲困，今又饑饉，料豆渴乏，平安一道受弊不淺。然殿下即位未久，皇帝寵恩已極，不可不從。」⁸⁰

此時的朝鮮國王為世宗，想請明朝傳授火藥武器的技術，但大臣認為此舉會引起明朝猜忌或要求朝鮮一起攻打日本，讓世宗打消念頭。明正統九年10月12日（朝鮮世宗二十六年10月12日，1444年11月21日）：

上謂承政院曰：「……今本國既獻倭俘，中朝又降禦寇之勅，奏請火砲，此其時矣。」……右議政申概、左贊成河演、左參贊權蹏、右參贊李叔時等議曰：「今者皇帝雖視同一家，豈盡信海外之國乎？朝廷無乃疑貳於其間乎？雖幸準請，設若倭賊陵犯上國，而上國降勅云：『汝國既已傳習，兵船與火砲，備此二物，

80. 국사편찬위원회, <세종실록 21 권, 세종 5년 8월 2일 경술 1번째기사 1423년 명 영락(永樂) 21년 병조 판서 조말생이 중국측이 요구한 말 1만필을 5천필로 줄이도록 건의하다>, 2017年9月18日(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da_10508002_001>。

又峙糧餉以待之，朕將命將以征日本。」則將何辭以待之？且近奏請之事數矣，無乃煩瀆乎？今乃奏請，而後又有不得已奏請之事，如之何？臣等之意，不若不請之為愈也。」從概等議。⁸¹

土木堡之變前，明英宗御駕親征，朝鮮得知此事後的態度是消極應對。明朝遼東指揮使赴朝鮮邀兵，朝鮮國王世宗予以敷衍。明正統十四年9月9日（朝鮮世宗三十一年9月9日，1449年9月25日）：

遼東指揮王武來，王世子率百官迎勅于慕華館。其勅曰：「……王宜調集精兵十數萬，令大頭目統領，與遼東諸將大兵，約會夾擊，務在撲滅此賊。若此賊亡滅，庶幾上順天道，下合人心，非惟遼東之利，亦王國之利。朕嘉之忠義，必大頒恩賚，凡國之頭目有功者，皆厚賞不吝，王其為國為民，以副朕懷。其亮之其亮之，故諭。」上以事關兵機，秘不發。⁸²

隨後世宗更決定上奏明朝，懇請求免除參戰之責。理由是朝鮮四面受敵、分身乏術，言詞謙卑。明正統十四年9月19日（朝鮮世宗三十一年9月19日，1449年10月5日）：

欽惟聖上，憐憫小邦。諭以虜情，反復謹飭。隄防聖訓，丁寧切至，臣不勝感激欽遵外。竊念調集精兵，與遼東諸將約會夾擊一節，本國東西南三面，皆岸大海，……緣此四面無非受敵去

81. 국사편찬위원회, 〈세종실록 106 권, 세종 26년 10월 12일 정사 3번째 기사 1444년 명 정통(正統) 9년 승정원에 중국의 화포 기술을 익히는 방법에 대해 논의하게 하다〉, 2017년 9월 18일(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da_12610012_003>。

82. 국사편찬위원회, 〈세종실록 125 권, 세종 31년 9월 9일 丙戌 1번째 기사 1449년 명 정통(正統) 14년 왕세자가 모화관에서 칙서를 맞이하다〉, 2017년 9월 18일(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3109009_001>。

處，數多水陸守備，……士卒，尚有不敷。若分些少軍馬，出赴境外，竊慮倭寇、野人乘間作耗，為害非輕，亦貽聖上東顧之憂，審度事勢，進退惟谷，戰兢無措。儻或北胡來犯小邦，臣當盡力勦擊。竊伏惟念，自臣祖父以及臣身，厚蒙列聖恩渥，保守小邦，凡有朝廷之命，盡心欽依，圖報萬一，若有分寸餘力，安敢罔冒天聽！不勝惶恐隕越之至。⁸³

隨後，明英宗遭俘、新帝繼位的消息傳入朝鮮，朝鮮內部對於如何對應的考量重點，是如何不開罪於明朝。明正統十四年 9 月 29 日（朝鮮世宗三十一年 9 月 29 日，1449 年 10 月 15 日）：

皇帝誤陷虜庭，新皇帝即位。有如此大變，進賀與陳慰，宜速為之。……上為太上皇帝欲行哭臨，命集賢殿考古制，以古無其禮不果，遂以判中樞院使南智為賀登極使，大司憲趙遂良為副使，中樞院使李明晨為陳慰使。⁸⁴

關於土木堡之變前後，明朝與瓦剌之間的軍事情勢與相對實力，李朝實錄中並無記載朝鮮內部的討論，因此無從直接得知朝鮮並未在明朝遭此重挫之際乘機擺脫明朝，是因為認為明朝仍然強大，還是因為對明朝的文化認同。不過，從先前朝鮮內部對明朝的諸多抱怨，但在正式文書上卻對明朝又是謙卑懇求的狀況來看，現存的證據明顯是支持現實主義式的權力政治解釋。

83. 국사편찬위원회, 〈세종실록 125 권, 세종 31 년 9 월 19 일 丙申 2 번째기사 1449 년 명 정통(正統) 14 년 한성부 윤 김하가 북경에 가지고 간 징병 면제를 주청하는 표문〉, 2017 年 9 月 18 日(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3109019_002>。

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세종실록 125 권, 세종 31 년 9 월 29 일 병오 2 번째기사 1449 년 명 정통(正統) 14 년 새 황제 즉위함에 따라 진하 진위사를 보낼 것을 논의하다〉, 2017 年 9 月 18 日(檢索),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da_13109029_002>。

伍、結論

「朝鮮因認同明朝中國的儒家文化，而歡迎明朝這樣的崛起中國」這樣一個推論，經過本文考察史料之後，儘管決策討論記錄不多，但從所獲得的證據來看，明顯是未獲支持。朝鮮並不因為崛起的明朝的內涵是儒家文化，就歡迎這樣的崛起中國。在北元勢力還在時，朝鮮遊走於明朝與北元之間，北元勢力消退後，朝鮮倒向明朝，是因為自認無力反抗。此後朝鮮雖然在對明朝的正式文書中極度謙卑，但在內部其實對明朝有諸多抱怨，只是敢怒不敢言，擔心禮數不周而開罪明朝。這樣的研究發現，看似是提供了一個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間論戰勝負的明顯判準，明初時朝鮮對明朝順服而內心抗拒，的確是相當符合權力政治邏輯的預期。然而，相同的證據卻也一樣指出，此時的朝鮮對明朝其實並無文化認同感，故也不是真心順從明朝。

易言之，朝鮮對明朝服從之餘仍埋怨，是現實主義權力政治邏輯（力量不敵明朝）與建構主義文化認同邏輯（不認同明朝文化）都可以解釋的，兩者其實未必全然互斥。對於本文一開始所提出，「朝鮮接受內涵上為朝鮮所認可的崛起中國」，這後一段的建構主義論點，雖然的確未獲支持；但「朝鮮拒斥內涵上不為朝鮮所認可的崛起中國」，這前一段的建構主義論點，依然是成立的：因朝鮮尚未認同明朝的文化，故雖按照權力政治的邏輯而服從明朝，但仍有所抗拒，可見文化認同仍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從此，再對照既有對明末中韓關係的研究，即凸顯出有待後續研究探索的疑點：明初之際朝鮮對明朝是畏懼而非欽慕，然到了明末明朝衰頹之際，朝鮮已是死心塌地認同明朝，這樣的文化認同感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是因為150年後明朝在1592年與1597年，兩度不辭艱險協防朝鮮抵抗日本入侵，使朝鮮心生感念並從此相信明朝儒家文化並非虛言嗎？抑或是雙方150年長期的密切來往，逐漸產生了彼此之間的文化認同感，使朝鮮對明朝從不情

願的服從，慢慢變得心悅誠服？

如此針對歷史上中韓關係的持續探索，對當代中國崛起的議題將有重要的啟示：儘管從第一眼來看，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邏輯，確實如一般的印象與常識，經常能解釋許多國際現象，但進一步仔細檢視就可以發現，光是看現實主義的物質因素的確是不夠的，許多例外的謎團仍需要從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觀點才能夠了解。或許當今中國崛起建立區域霸權之際，周邊國家的服從未必是因為區域國家對中國的文化認同，而是強制性的實力差距所致，但若中國往後能與周邊國家建立起彼此的文化認同，仍有助於維繫區域的秩序與穩定。於是乎，中國自己的文化能否展現美好、進步的一面而為人所接受，也會是重要的因素。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執行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606-006）。

（收件：2017年10月11日，修正：2018年1月22日，採用：2018年1月26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7。《明實錄 二》。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7。《明實錄 三》。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7。《明實錄 四》。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7。《明實錄 五》。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7。《明實錄 六》。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7。《明實錄 七》。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7。《明實錄 八》。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 毛佩琦、李焯然，1994。《明成祖史論》。臺北：文津出版社。
- 白永瑞，2009。《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朱立熙，2008。《韓國史》。臺北：三民。
- 吳 晗，1980。《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
- 杜維運，1998。《中國史學史（二）》。臺北：三民。
- 杜維運，2004。《中國史學史（三）》。臺北：三民。
- 林月惠、李明輝，2015。《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金富軾編著，孫文范等校勘，2003。《三國史記》。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姜吉仲，2004。《高麗與宋金外交經貿關係史論》。臺北：文津出版社。
- 范永聰，2009。《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葉泉宏，1991。《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鄭永常，2004。《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臺北：稻鄉。
- 錢穆，1982。《國史大綱》。臺北：國立編譯館。
- 韓儒林主編，2008。《元朝史 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 簡江作，1998。《韓國歷史》。臺北：五南。

專書譯著

- 李元淳、崔柄憲、韓永愚著，詹卓穎譯，1987。《韓國史》。臺北：幼獅文化。
- 李基白著，林秋山譯，1985。《韓國史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

專書論文

- 王民信，2010。〈高麗王朝對遼金元初興時的「拒」與「和」〉，王民信主編，《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63-78。
- 陶晉生，1984。〈宋、高麗與遼的三角外交關係〉，陶晉生主編，《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頁 169-180。
- 黃寬重，1983。〈南宋與高麗的關係〉，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主編，《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頁 61-85。

期刊論文

- 刁書仁，2002/3。〈論明前期斡朵里女真與明、朝鮮的關係—兼論女真對朝鮮向圖們江流域拓展疆域的抵制與鬥爭〉，《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2002年第1期，頁44-54。
- 王元周，2009/10。〈韓國人的歷史觀與中韓關係〉，《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09年第4期，頁138-155。
- 王永一，2005/3。〈女真東北面登場的朝鮮太祖李成桂研究〉，《中國邊政》，第161期，頁27-38。
- 王永一，2009/3。〈朝鮮初期女真族裔大臣李之蘭在政界的活躍〉，《中國邊政》，第177期，頁45-58。
- 王建宏、趙莎，2014/12。〈「唐風東漸」與新羅「骨品制」的瓦解—以新羅的遺唐留學生為中心〉，《懷化學院學報》（懷化），第33卷第12期，頁7-9。
- 李海英，2015/9。〈唐朝與新羅的海上通路與文化交流—以留學生、佛僧為例〉，《通化師範學院學報》（通化），2015年第9期，頁97-101。
- 李揚帆，2009/3。〈身份認同：韓國對中韓歷史的選擇性敘述與中韓關係〉，《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09年第1期，頁44-60。
- 金渭顯，2006/6。〈《高麗史》對於研究遼史金史的貢獻〉，《東吳歷史學報》，第15期，頁117-144。
- 苗威，2009/2。〈三國史記的歷史影響探析〉，《北京理工大學學報》（北京），第11卷第1期，頁33-38。
- 姜清波，2012/11。〈百濟國末代王室及後裔在唐朝的漢化過程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州），第166期，頁151-154。
- 姜維東，2006/4。〈唐朝對東北亞諸政權的文化輸出研究〉，《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06年第4期，頁139-141。
- 孫紅梅，2008/3。〈元朝與高麗「舅甥之好」關係下的文化交流〉，

- 《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錦州），第 30 卷第 2 期，頁 101-106。
- 陳 永，2015/3。〈百濟音樂舞蹈的源流、研究現狀及當代研究的可能性取向〉，《星海音樂學院學報》（廣州），第 138 期，頁 128。
- 張春海，2008/5。〈高麗移植唐代法制之變形及其歷史背景〉，《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2008 年第 3 期，頁 71-79。
- 張登及、金世勛，2017/6。〈朝貢體系下中小國家的避險行為：朝鮮半島兩個歷史案例初探〉，《政治學報》，第 63 期，頁 63-79。
- 陶 然，2011/9。〈論宗藩體系下元麗文學交流的新格局〉，《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杭州），第 41 卷第 5 期，頁 43-49。
- 郭 麗，2016/10。〈唐代留學生教育管理制度述論〉，《北京社會科學》（北京），2016 年第 10 期，頁 65-72。
- 程尼娜，2013/2。〈隋唐高麗朝貢制度研究〉，《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13 年第 2 期，頁 105-115。
- 楊仕樂，2016/12。〈中國文化與中國對外行為：「興滅繼絕」理念與朝鮮「壬辰倭亂」〉，《政治科學論叢》，第 70 期，頁 159-196。
- 楊仕樂，2017/3。〈東亞朝貢體系的實證檢驗：朝鮮的案例研究 1618-1637〉，《問題與研究》，第 56 卷第 1 期，頁 53-79。
- 楊仕樂，2017/12。〈儒家文化、軟權力與霸權抉擇：清初的案例研究（1676-1735）〉，《政治學報》，第 64 期，頁 75-103。
- 盧鳴東，2006/1。〈以禮治國：朝鮮建國儒臣推行中國古禮的作用〉，《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長沙），第 20 卷第 1 期，頁 44-51。
- 羅樂然，2014/12。〈漢語與事大——從朝鮮的漢語翻譯人材培訓看其對明政策的轉變〉，《漢學研究集刊》，第 19 期，頁 109-136。

韓文部分

網際網路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1 권, 총서 46 번째 기사 태조가 동북면 원수가 되어 기철의 잔당과 북원과의 관계를 차단하고, 동녕부를 회복코자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46>。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1 권, 총서 49 번째 기사 동북면을 공격하고 나하추 등이 있는 곳에 방을 붙여 기사 인척목아의 행방을 탐문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49>。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1 권, 총서 81 번째 기사 명에서 철령 이북의 땅을 요구하자 요동 정벌을 논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81>。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1 권, 총서 83 번째 기사 요동 정벌이 결정되었으나, 4 가지 불가한 이유를 들어 태조가 반대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83>。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1 권, 총서 84 번째 기사 태조가 조민수와 함께 위화도에서 회군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0000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2 권, 태조 1 년 11 월 27 일 갑진 1 번째기사 1392 년 명 홍무 (洪武) 25 년 국호를 정하는 문제에 대한 예부의 자문을 계품사 조임이 가져오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10111027_001>。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3 권, 태조 2 년 5

월 23 일丁卯 1 번째기사 1393 년 명 홍무(洪武) 26 년 흠차 내사 황영기 등이 조선의 국왕을 위협하는 조서를 가지고 오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10205023_001#>。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3 권, 태조 2 년 5 월 25 일 기사 2 번째기사 1393 년 명 홍무 (洪武) 26 년 이성 등지로부터 의탁한 여진인을 돌려 보내도록 하고, 황제에게 주문할 일을 의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aa_10205025_00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5 권, 태조 3 년 1 월 16 일 병진 1 번째기사 1394 년 명 홍무 (洪武) 27 년 수창궁에 거동하다. 관문하부사 안중원 등이 경사로 가지고 간 표문〉,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aa_10301016_001>。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조실록 14 권, 태조 7 년 5 월 14 일 경신 2 번째기사 1398 년 명 홍무 (洪武) 31 년 천추절 계본을 잘못 쓴 3 사람을 추가 압송하라는 예부의 편지와 조서 및 광해룡의 문초장〉,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aa_10705014_00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정종실록 4 권, 정종 2 년 5 월 17 일辛巳 2 번째기사 1400 년 명 건문 (建文) 2 년 경연에서 《통감촬요》를 강론하다가 권근과 요동의 정세를 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ba_10205017_00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종실록 3 권, 태종 2 년 3 월 6 일 기축 1 번째기사 1402 년 명 건문 (建文) 4 년 하성절사 최유경이 연왕의 군사가 경사를 쳤다는 소식을 전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ca_10203006_001>。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종실록 6 권, 태종 3년 9월 9일 甲申 2 번째기사 1403년 명 영락(永樂) 1년 우정승 성석린 등이 면복과 서책을 내린다는 예부의 자문을 가지고 오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0309009_00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종실록 12 권, 태종 6년 8월 24일 庚戌 3 번째기사 1406년 명 영락(永樂) 4년 길창군 권근이 전위의 불가함을 상서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0608024_003>。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종실록 17 권, 태종 9년 3월 16일 기미 3 번째기사 1409년 명 영락(永樂) 7년 상선이라고 주장하는 왜선 2 척을 잡다. 병마 도절제사 윤자당이 모두 죽이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ca_10903016_003>。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태종실록 18 권, 태종 9년 11월 14일 임오 2 번째기사 1409년 명 영락(永樂) 7년 군량의 확보, 진헌마, 왜인의 본국 거주 등에 관한 문제점을 지적한 사간원의 시무책〉,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ca_10911014_002>。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세종실록 21 권, 세종 5년 8월 2일 경술 1 번째기사 1423년 명 영락(永樂) 21년 병조 판서 조말생이 중국측이 요구한 말 1만필을 5천필로 줄이도록 건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da_10508002_001>。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세종실록 106 권, 세종 26년 10월 12일 정사 3 번째기사 1444년 명 정통(正統) 9년 승정원에 중국의 화포 기술을 익히는 방법에 대해 논의하게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da_12610012_

003>。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세종실록 125 권, 세종 31 년 9 월 9 일 丙戌 1 번째기사 1449 년 명 정통(正統) 14 년 왕세자가 모화관에서 칙서를 맞이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3109009_001>。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세종실록 125 권, 세종 31 년 9 월 19 일 丙申 2 번째기사 1449 년 명 정통(正統) 14 년 한성부 윤 김하가 북경에 가지고 간 징병 면제를 주청하는 표문〉,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3109019_00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7/9/18 (檢索)。〈세종실록 125 권, 세종 31 년 9 월 29 일 병오 2 번째기사 1449 년 명 정통(正統) 14 년 새 황제 즉위함에 따라 진하 진위사를 보낼 것을 논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da_13109029_002>。

英文部分

專書

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5.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Wang, Yuan-Kang, 2011.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ang, Shih-Yueh, 2017.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ese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1745-1860*. Saarbrücken: Golden Light Academic Publishing.

專書論文

Levy, Jack S., 2008.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bert S. Ross &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1-33.

期刊論文

Behr, Hartmut & Amelia Heath, 2009/4. "Misreading in IR Theory and Ideology Critique: Morgenthau, Waltz and Neo-Re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2, pp. 327-349.

Kang, David C., 2003-2004/Winter.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pp. 165-180.

Kang, David C., 2010/10.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pp. 591-622.

Mearsheimer, John J., 2003/6. "Author's Response: Will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lash?" *Issues & Studies*, Vol. 39, No. 2, pp. 259-262.

Wendt, Alexander, 1995/Summer.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pp. 71-81.

附錄

附表 明初中韓關係事件年表

1368年（洪武元年）	朱元璋圍攻元大都，並派水師北上，高麗也派兵協助明軍防務。同年明朝建立。
1369年（洪武二年）	明朝下詔冊封高麗國王。
1370年（洪武三年）	高麗上繳元朝所賜金印，接受明朝冊封。同年高麗以李成桂為東北面元帥，出兵征討北元。
1372年（洪武五年）	明朝護衛官於往韓途中自縊，明朝認為是高麗陰謀，雙方關係緊張。
1374年（洪武七年）	高麗發生政變，暗殺明朝使節。
1377年（洪武十年）	奉翊大夫李成桂受命討伐黃海道倭寇。高麗接受北元冊封，停用洪武年號，明朝囚禁高麗使節。
1378年（洪武十一年）	明朝釋放高麗使節，雙方關係舒緩。
1379年（洪武十二年）	謠傳高麗將聯合北元攻打明朝。明朝審訊高麗使節致死，雙方關係緊張。
1380年（洪武十三年）	明朝救援高麗海上難民，發現行李中的文書用洪武年號，遂派人護送返韓，雙方關係舒緩。
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	明朝出兵大敗北元，於二月通知高麗，將於遼東、朝鮮半島北段劃設軍事行政區「鐵嶺衛」，並於五月開始派兵進駐。高麗欲聯合北元進攻明朝，但將領李成桂認為此時出兵勝算不大，故於六月發動政變。自此王氏高麗王朝結束，開啟李氏朝鮮王朝。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李成桂正式即位。遣使呈送高麗王印給明朝，請求明朝冊封。對此明太祖只給新國號「朝鮮」，此外皆無答覆。
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	明朝將「鐵嶺衛」的範圍限縮到鴨綠江為止。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	李成桂再次派人請求冊封，明太祖不接見使節，並令禮部回覆朝鮮，指朝鮮內部誰當國王與明朝根本無關。收到詔書的李成桂當作沒發生這件事。
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	李成桂三次派人請求冊封，但書信不夠謙卑，被明朝斥退。李成桂寫信道歉，說自己用人不當，資淺文官賣弄文筆，造成誤會。

1397年（洪武三十年）	明太祖要禮部告知李成桂，用人小心，否則會因文辭不當而滅國。對此，李成桂五月派人上貢、謝罪謝恩，但又被明太祖拒絕。九月，朝鮮再次上貢，明朝辦事人員叮囑朝鮮使節上貢要按時，但被朝鮮使節反唇相譏，明朝遂囚禁朝鮮使節。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	五軍督護府聯合兵部共同上書，請求明太祖出兵懲罰不夠恭順的朝鮮。明太祖拒絕，認為這樣的朝鮮自己就會衰敗，沒必要出兵。
1401年（建文三年） 明成祖篡位後改為洪武三十四年	明惠帝封李芳遠為朝鮮國王，是為朝鮮太宗。
1403年（永樂元年）	明成祖賜李芳遠為朝鮮國王金印，正式承認朝鮮是明朝的藩屬國。
1404年（永樂二年）	朝鮮無法負荷遼東偷渡到朝鮮的難民，請求明朝處理，明成祖也派專人處理。
1411年（永樂九年）	禮部尚書趙珣私吞原要給朝鮮來使的賞賜，明成祖拘捕趙珣。
1418年（永樂十六年）	朝鮮仁宗欲廢太子，改立三弟的兒子為儲君，連續兩次遣使請示明成祖。明成祖回覆要朝鮮自己決定，不用請示。
1419年（永樂十七年）	朝鮮仁宗退位，朝鮮世宗登基。明成祖遣使承認並冊封。
1449年（正統十四年）	瓦剌四路大軍進攻遼東，明軍將領盡數陣亡。明英宗親征，遭俘，朝鮮方面未出兵支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119-176；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頁1-121。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a's Ris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hinese-Korean Relations 1368-1449

Shih-yueh Y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is a topic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world nowadays. In contrast to the realist logic of power politics, constructivism holds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China are not determined by material factors but by the identity of China with respect to its neighbours. The view neighbouring countries have of China and its rise will vary according to their understanding of what China is. This will also influence mutual relations. This paper asks if this is in fact the case. It adopt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compares China's rise under the Qin-Han, Sui-Tang, Liao, J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ith a focus on Korea during the early Ming. The paper examines whether Korea's non-acceptance of China led to a rejection of China's rise and whether Korean acceptance of China led to acceptance of China's rise.

Keywords: Realism, Constructivism, Cultural Identity, Rise of China, China-Korea Relations

